

村寨

撒拉族

青海循化县石头坡村调查

中国民族村寨调查丛书

主编：朱和双
谢佐
副主编：马伟



撒拉族

青海循化县石头坡村调查

中国民族村寨调查丛书

主编：朱和双
谢佐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撒拉族：青海循化县石头坡村调查 / 朱和双，谢佐主编。
—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

(中国民族村寨调查丛书 / 高发元主编)

ISBN 7-81068-781-6

I . 撒 … II . ①朱 … ②谢 … III . 撒拉族 — 居住区
— 调查报告 — 循化县 IV . K28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5921 号

撒拉族——青海循化县石头坡村调查

主 编：朱和双 谢 佐

责任编辑：纳文汇 宋 武

责任校对：段建堂 虞 宏

装帧设计：刘 雨

出版发行：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15.5

插 页：8

字 数：370 千

版 次：200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1068-781-6/C·64

定 价：32.00 元

云南大学出版社地址：云南大学英华园（邮编：650091）

电 话：0871-5031071

E-mail：market@ynup.com

传 真：0871-5162823

总序

云南大学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 高发元

1956年～1958年，国家有关部门在全国组织进行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工作，搜集到上千万字的资料，撰写出少数民族简史、简志和自治地方概况三套丛书的书稿，整理调查资料300余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编写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即《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书》）。这次调查为党和政府制定社会主义民族政策和工作方针，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民主改革和进行经济建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开创了我国进行大规模少数民族调查的先河，为民族研究搜集与积累了大量弥足珍贵的资料。时至今日，其成果仍然是开展民族工作的重要依据，是民族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和反复引述的基础材料。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各少数民族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无论是进行决策的党政部门，还是进行理论研究的学术界，要深入进行民族调查的愿望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各级党委、政府迫切需要系统地了解少数民族发展变化的现状，深入探讨少

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科学地把握少数民族发展的趋势，以制定出适合于各少数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民族政策和发展规划。

如何在新的时期开展民族调查，以获得开拓性的成果，这就不能囿于传统的民族调查方式，而必须有新的观念、新的方式。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说，分化与整合，是当代学术研究发展的两大趋势。一方面，各个学科的发展呈现出日益分化的趋势，学科划分越来越细；另一方面，又呈现出学科之间的整合趋势，各个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交叉，其界限越来越模糊，跨学科研究与交叉学科不断增多。

民族学以民族共同体为研究对象。民族共同体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又是一个多元化的系统，包含着语言、人口、经济、政治、文化、宗教、教育、科技、卫生等诸多子系统。因而民族学不能仅关注民族的某一局部，必须关注民族的各个方面、整个系统。为此，“对于人类学家来说，一般都要花费许多时间与人类学以外的专家共同研究。这些时间超过与其他在野外方面的人类学家磋商的时间。”^① 这就是说，如果要对民族的各个方面完整系统地作深入调查研究，仅靠民族学自身特有的理论和方法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民族和文化的领域十分广阔，单靠民族学的专门化已无法驾驭层出不穷的新的重大课题，这就要借助于其他学科。任何一个民族学工作者都不可能掌握全面的多学科的知识和技术，这就要求民族学运用整体论的观点，打破学科封闭，与其他学科交叉协作，进行综合调查研究。”^② 民族调查与研究的实践和历史充分证明，民族学必

^① F. 普洛格、D.G. 贝茨著，吴爱明译：《文化演进与人类行为》，第 12 页，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② 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修订本，第 166 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须经常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才有可能在许多问题的研究上取得较快的进展与重大的突破，从而不断进步与发展。

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继 2000 年组织对云南省人口在 5 000 人以上的 25 个少数民族村寨进行调查后^①，2003 年 7 月～8 月又组织了对全国 32 个少数民族村寨的调查。与在云南进行的调查一样，全国的民族村寨调查采取了一个“深入”、两个“综合”的方式。一个“深入”，即不对每个民族做广泛的面上的调查，而是每个民族各选取一个有代表性的典型村寨，在这一个点上进行深入的调查。两个“综合”，一是调查内容的综合，即对每个民族村寨都进行人口、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风俗习惯、法律、婚姻家庭、宗教、科技、卫生、教育、生态等诸方面的综合调查。二是调查人员的学科综合。在这次调查与研究过程中，除了一部分民族学专业的教师和学生外，大部分调查人员和研究人员来自云南大学和全国 15 个省区有关大学、科研单位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涵盖了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政治学、伦理学、档案学、管理学、人口学、旅游学、语言学、艺术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大部分学科，还有一部分自然科学方面如生态学、遗传学、建筑学的人员参与，并专门进行了遗传信息方面的调查。整个调查工作涉及到的总人数为 203 人，其中云南大学的师生 105 人，其他省区 98 人。调查人员中，教师和科研人员 110 人，占 54%（教授 32 人，副教授 40 人，讲师 31 人，高职人员共 72 人，占总人数的 66%）；干部 11 人，占 6%；学生（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82 人，占 40%。调查队伍

^① 调查由云南大学的 142 名师生完成，形成了 25 本调查资料、1 本专题研究报告、1 本画册，已由云南大学出版社于 2001 年出版。此外，还拍摄录制了一批录音带、录像带、照片，采集了云南少数民族 1 300 多人的血样，建立了少数民族遗传信息资源库。

以中青年为主，其中 45 岁以下 170 人，占总人数的 84%。

经过周密部署和精心组织，此次调查虽然历时不长，但取得的成果是多方面的：

1. 作为云南大学建校 80 年来第一次组织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民族调查，接触到了省外各民族的习俗和风情，开阔了视野，为云南大学民族学重点学科的建设和上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与国内相关省区建立起了密切的学术联系，为以后的民族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省外 32 个调查点可以成为云南大学今后长期合作研究的基地。

2. 积累了跨省区、跨校合作开展田野调查和进行研究的经验。诚如民族学界所指出的：“大规模的综合调查不是少数人所能承担的，组织协调也比较复杂、困难。”^① 这次调查的 32 个少数民族村寨，分布在全国 15 个省区，地域非常广阔，仅靠云南大学的力量是难以完成的。因此，这次调查突破了一般传统，与所调查民族地区的有关单位合作，分工完成。15 个省区的 41 所大学、科研单位、政府有关部门积极参与了由云南大学组织的调查和文稿撰写工作。其中，台湾佛光大学承担了台湾高山族（泰雅人）的调查，开了该校与大陆合作进行民族田野调查的先河。

3. 此次调查以多学科的形式合作配合，交叉渗透，对于民族调查工作来说，具有突破性的意义。比如在此次调查中，加入了体质健康调查小组，仅用 1 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 31 个民族（不包括台湾泰雅人）约 1500 多份血样的采集，也搜集到了部分实物。这样，调查工作就为云南大学少数民族遗传信息资源库建设、博物馆建设等创造了一定条件。

^① 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修订本，第 166 页。

4. 此次调查收集了大量的文字、音像资料，大部分为第一手资料，为调查资料的整理、写作以及专题研究提供了条件，也弥补了过去有关民族调查中调查手段或内容单一的不足。共形成了32个少数民族村寨的调查资料32本，文字总量1000余万字；形成了民族生态、人口、经济、社会、政治、法律、婚姻家庭、文化、风俗习惯、教育、科技、卫生、宗教13个专题研究报告，文字总量约为30万字；1本调查工作实录28万字。此外，32个民族调查组均拍摄了大量照片，内容包括生态环境、生产工具、生活场景、文化习俗、宗教活动等各个方面，照片总量达10000余张。许多调查组运用了影视人类学的方法，拍摄了近百盘录像带。有些调查组对民族语言、民歌、民谣等进行了录音，带回一批录音带。

5. 锻炼了队伍，培养了人才。作为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民族学必然要以田野工作为其研究的主要途径和基本方法。可以说，田野调查是民族学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在调查过程中，各调查组克服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障碍，磨炼了调查人员特别是学生的意志，运用与深化了所学的理论知识，掌握了田野调查的工作方法，在实践中锻炼了思想品德，增长了才干。同时一批新的人才加入到民族研究的队伍中来，增强了民族研究的力量。

当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组织规模如此浩大的民族调查，问题和不足在所难免。如有的调查人员缺乏调查经验，有的调查还比较粗糙。从总体上看，各本调查资料之间的调查深度和研究水平并不完全一致，有高低、深浅之分；从每一本调查资料来看，各部分之间的调查深度和研究水平也不完全一致，也有高低、深浅之别。这大概是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和众手成书情况下都不可避免的问题。

现在，我们把32个民族村寨的调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

专题研究报告整理出来公开出版，是因为这些成果真实地记录了现在时段这些民族村寨的全貌，是第一手的最新资料，相信会有现实的参考价值和历史的保存价值。其中调查工作的实录，比较具体完整地反映了这次工作的整个情况，相信也是有意义的。

民族调查是一项长远的宏伟的工程，这次的成果也仍然只是我们的一个起点，我们的工作还会长久地进行下去。诚恳地希望一切关心民族问题，研究民族问题的同仁给我们批评，指正，使这一幼苗能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2004年5月

前　　言

在云南大学“中国民族村寨调查”领导小组的精心策划、组织和安排下，我们承担了撒拉族的调查任务。我们这次对撒拉族进行的田野调查，意在对新中国建立五十多年来撒拉族社会的发展变化情况作一些了解。在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马伟等同志的帮助下，我们选择了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积石镇石头坡村的撒拉族作为我们调查的对象。从 2003 年 7 月 22 日到 2003 年 8 月 21 日，我们在石头坡村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田野调查。

一、撒拉族调查点的基本情况

撒拉族是我国西北民族走廊地带的一个小民族，也是青海省特有的少数民族之一。受其独特的民族文化、聚居区社会经济发展特征等因素的影响，撒拉族人口的数量、质量、结构及其人口发展的规律等呈现出相应的特殊性。撒拉族人口的地区分布呈小聚居、大散居的特点。一方面集中分布在青海、甘肃、新疆三省区，其中青海一直是撒拉族人口聚集的中心，1990 年有 76 818 人，占全国撒拉族总人口的 87.75%；甘肃有 6 740 人，占 7.69%；新疆有 3 706 人，占 4.23%。就聚居区域而言，主要有两大块：一是黄河上游沿岸地区，包括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以及毗邻的青海省化隆县甘都镇和甘肃省的积

石山县，这里是撒拉族的传统聚居区，也是目前撒拉族人口最集中的地区，其所占比重达撒拉族总人口的 86.20%；另一个撒拉族的聚居区是新疆的伊犁地区，占撒拉族总人口的 2.80%，他们大都是清末“河湟事变”后相继迁去的。^① 另一方面，中国大陆各省、市和自治区均有撒拉族的零星分布，主要是因经商、求学或工作等原因而临时性或永久性迁去的。

这一次我们选择的调查点位于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积石镇的石头坡村。石头坡村位于循化县中部，地处东经 102°29'，北纬 35°51'，海拔 1780 米，年平均气温 9℃，年均降雨量 300 毫米。年日照时数达 2685 小时。石头坡村北临黄河（部分土地还在黄河以北），西邻积石镇的丁匠村，东接积石镇的托坝村与沙坝塘村，南连街子乡的团结村、马家村，黄丰渠和临平公路贯穿全村。截至 2003 年 8 月底，石头坡村共有 4 个村民小组，144 户，746 人，全村劳动力 398 人，其中女性占 184 人。大部分为撒拉族，一小部分也自称撒拉族，但其身份证上填报的是回族。全村耕地 456.9 亩，均为水浇地，人均耕地 0.46 亩；总牲畜头数为 231 头（只），其中大牲畜 22 头，绵羊 209 只。2000 年时的人均收入为 660 元。村里有一所完小，在校学生 116 名，适龄儿童入学率为 87.9%。村里每家每户都接通了自来水，40 多户人家装上了电话，村里还有一名村医。石头坡村气候温和，夏无酷暑，冬无严寒。无霜期约 220 天。全村绿化面积在 70% 以上，树种主要有苹果树、核桃树、柳树、杨树、榆树、杏树、梨树等。冰雹、霜冻、洪涝、干旱等灾害是全村农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

^① 刘成明：《撒拉族人口状况分析》，载《青海民族研究》2000 年第 3 期。

二、选择撒拉族调查点的理由

撒拉族调查组成员由六人组成，并实行双组长制。云南大学方有三人，组长为朱和双，目前正在云南大学人类学系攻读民族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同时在云南楚雄师范学院地方民族文化研究所从事专职科研工作；组员孙毅，为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组员谭晓霞，目前正在云南大学人类学系念书。合作方也有三人，组长谢佐为青海省地方志办公室教授；组员有马伟和马玉芳，分别为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教授和助教，两人为来自循化县的撒拉族。我们选择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积石镇石头坡村作为撒拉族的调查点，有如下理由：

第一，石头坡村在经济方面虽然仍以农业为主，但第三产业和商业占了相当的比重，特别是近几年来，运输业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目前村民们的主要收入依赖于第三产业，而不再是农业。这些为我们了解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撒拉族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变迁是一个非常好的个案材料。因为我们此次的调查既要关注到撒拉族传统的生活、生产方式，还要关注到撒拉族地区发生的新变化。以石头坡村作为撒拉族调查的田野点，能使我们更好地了解处于各种发展层次上的撒拉族。

第二，石头坡村在整个循化撒拉族地区来说，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处于中等水平。从个人经济收入来说，石头坡村比起循化撒拉族的中心地区——街子——来说要落后一些，但比起经济不发达的白庄、孟达等循化撒拉族地区来说，石头坡村的经济水平又是相当高的。选择石头坡村这样的田野点作为调查对象，既避免了以发展程度较高的街子地区来代表撒拉族发展变化的片面性，同样也避免了以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来代表撒拉族

存在的问题。以石头坡村作为撒拉族社会经济变迁的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撒拉族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变化的一般情况，这也较能符合云南大学组织这次调查的目的所在。

第三，石头坡村位于循化县城和街子三岔的中间地带，距县城不到三公里，距三岔两公里左右，交通便利。从循化县的民族分布情况来看，石头坡村刚好处于撒拉族和回族的分界线上。石头坡村东面是回族分布区，即当地统称的“中原四庄”，从石头坡村以西为撒拉族分布区。并且石头坡村既有撒拉族，也有回族，只是以撒拉族为主体。从历史上以来，撒拉族与回族之间由于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彼此之间的联系是相当密切的，这种联系尤其表现在族际通婚问题上。例如石头坡村的韩、马两姓人家，对撒拉族的民族认同感很强，相对来说，陈姓人家对撒拉族的民族认同感要弱一些，他们认为自己填报回族或者撒拉族都可以。选择石头坡村作为田野调查的对象，可以对撒拉族和回族的情况作一些比较，这样也更加有利于我们对撒拉族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作更准确的把握。

第四，我们选择的调查点石头坡村，刚好就是调查组成员马伟的家乡，不但他自己对当地的情况比较了解，而且马伟的父亲长期以来担任石头坡村的村长（后改为村民委员会主任），对村里的情况更是了如指掌，马伟的弟弟马白克目前正担任石头坡村清真寺的阿訇，对宗教方面的情况比较了解。选择石头坡村作为田野调查点，就可以让我们进到点上以后能很快地开展工作，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周折。鉴于上述情况，石头坡村成为了我们此次撒拉族调查的首选地点。

三、对撒拉族调查工作的开展

在进入田野调查点以前，我们查阅了大量与撒拉族相关的文献资料。收集和查阅文献资料，是田野调查工作必要的前期

准备。因为我们的调查必须在前人调查的基础上完成，这样才能更好地总结前人调查的经验，同时也为我们的调查提供参考；调查组成员在大量阅读与撒拉族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也能对撒拉族生活的环境、社会历史和风俗习惯等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鉴于这次调查是以团体合作的方式进行的，所以我们在分配调查任务时，尽量考虑到个人的学科背景和相关情况。具体对石头坡村撒拉族调查任务的分工情况如下：

调查组组长朱和双，目前正在云南大学攻读中国少数民族婚姻家庭方向的博士学位，已获得楚雄师范学院助理研究员资格，对婚姻家庭有相应的学科背景，以前也作过与婚姻家庭相关问题的调查，因此在本次调查中主要负责人口与婚姻家庭两个方面的调查。

合作方组长谢佐，长期以来从事青海民族文化的研究工作，对基层社区的政治、法律和社会管理方面的情况较了解，因此在本次调查中主要负责社会政治与法律两个方面的调查。

组员马伟，本人是撒拉族，长期以来在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做有关撒拉族语言和宗教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因此在本次调查中主要负责语言和宗教两个方面的调查工作，同时充当有关调查的翻译工作。

组员马玉芳是撒拉族，在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从事撒拉族文化研究工作，对撒拉族有关的风俗习惯和民间文艺较为熟悉，因此在本次调查中负责上述两个方面的调查，同时在调查中还担任撒拉语的翻译工作。另外，马玉芳作为撒拉族女性的一分子，还对石头坡村撒拉族妇女的生育问题进行了调查。

组员孙毅，有经济学方面的学科背景，目前正在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因此在本次调查中主要负责

对经济和科技卫生方面的调查工作。

组员谭晓霞，目前正在云南大学人类学系念书，在本次调查中负责教育方面的内容。

我们对撒拉族的实地调查工作，在选好田野点之后就马上展开了。我们调查组的成员于 2003 年 7 月 22 日到达循化县，对撒拉族的基本情况作了一些面上的了解之后，于 2003 年 7 月 23 日早上 9 点到达石头坡村，立刻就展开了工作。我们为期一个月的田野调查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从 2003 年 7 月 23 日 ~ 2003 年 8 月 1 日，我们主要对石头坡村的撒拉族情况作面上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对调查提纲进行修正。根据调查点上的具体情况，对云南大学统一制作的民族调查大纲作具体化处理，使之完全符合石头坡村撒拉族的情况，同时制定出详细的写作提纲。经过十来天的调查，调查组成员把相关的调查项目不断细化，并且收集到了大量第一手的原始材料，为下一步的工作创造了条件。

第二阶段，从 2003 年 8 月 2 日 ~ 2003 年 8 月 11 日，调查组成员对上一阶段修改后的调查提纲进行充实，在调查工作中按提纲收集相关的材料。经过近十天的努力工作，终于把调查内容一步步充实起来，做到了在每一个调查小标题下面都有了相关的内容，可以说基本上完成了本次调查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

第三阶段，从 2003 年 8 月 12 日 ~ 2003 年 8 月 21 日，调查组成员对已经获取的调查资料进行完善和补充，对已经做过的调查作进一步的核实，对内容薄弱的环节进行充实和再调查，对调查中出现的新情况进行追踪，力求对石头坡村的撒拉族情况做到较全面的了解。经过这一阶段的工作，我们收集到了石头坡村撒拉族相关方面更加翔实的第一手资料。

四、调查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

在田野调查工作中，我们采用了问卷、访谈、个案调查、个人专访、分类调查、实地考察以及体质人类学测量等一系列方法，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参观展览。2003年7月17日，当调查组成员到达青海省省会西宁市以后，就迫不及待地要去寻找撒拉族的足迹。在合作方马伟老师的安排下，我们有幸参观了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的民俗资料陈列室。在撒拉族民俗资料陈列室里，调查组成员首次见到了撒拉族的生活、生产用具，还有撒拉族的各种服饰、宗教用品、饮食文化等实物资料，对撒拉族的了解从文字材料的层面上升到了实物层面。陈列室的讲解人员还对各种实物资料作了精彩的描述，并回答了调查组成员们的提问。在实地调查中我们所见到的各种实物，似乎在陈列室都见过，并且有了较深刻的印象，这也为我们调查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第二，开座谈会。在西宁做好了对撒拉族调查的前期准备工作以后，2003年7月22日，我们离开西宁到达循化县城积石镇，马上就到循化县委、县政府的有关部门找相关人员进行座谈。在座谈中，我们汇报了一些与调查相关的情况，并听取了他们对我们开展工作的一些建议。然后由县委统战部的同志带我们到了积石镇党委、镇政府，有关人员安排了对我们的接见工作，在座谈中他们还介绍了一些相关的情况，并决定由石头坡村驻村干事赵秀同志亲自陪同我们于7月23日一大早到达田野现场。在石头坡村，我们同样也组织了许多座谈会，请到了村里的阿訇、汉志（指到麦加朝觐过的穆斯林）、学董和村子里的头面人物多人参加，他们对我们的调查工作极为支持，并为我们的调查工作提供了很好的线索。调查期间，朱和

双同志、谢佐同志等分别与积石镇党委黄书记、镇政府韩镇长等多次进行座谈，没有这样的座谈会以及相关人士的一系列支持，我们的调查工作绝不可能如此顺利地开展。

第三，问卷调查。在调查过程中，采用问卷的形式开展工作是非常必要的。我们采用的问卷是为云南大学中国民族村寨调查统一制作的问卷，问卷容量大，涉及的面非常宽。对于石头坡村的调查，我们从一开始就充分发挥了问卷调查的作用，调查组成员在开展调查工作中，都对调查问卷不厌其烦地认真填写，对调查对象作耐心细致的解说，尽量让他们在充分理解问卷内容的基础上回答相关的问题。通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工作，我们一共完成了一百份调查问卷，这对调查小组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因为村子里的成年人尤其是男性都到外面打工去了，留在村子里的多数是妇女、老人和小孩，他们多数都是文盲，这给我们的问卷调查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调查组成员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遇到条件成熟的时候，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进行问卷调查的机会。大量的问卷调查为我们对资料的整理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四，参与观察。在村子里面，我们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参与观察的机会，尽管一开始我们对撒拉族穆斯林的生活和宗教活动怀有某种距离感，但很快我们就和他们拉近了距离。经过阿訇在清真寺的宣传，村子里的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在对他们进行调查。我们刚到石头坡村的时候，村民们正在打小麦，调查组成员的身影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打麦场。等到打小麦的活儿干完了，村民们又开始挖土豆、翻地，调查组成员就形影不离地跟着他们到田间地头。虽然我们干扰了他们的劳动，但村民们没有丝毫的厌烦，总是尽量地边干活，边回答我们的问题。为了了解撒拉族穆斯林的宗教文化习俗，我们尽量在他们允许的